

《道教义枢》研究

王宗昱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道家文化研究丛书



道家文化研究丛书

主编 汤一介 陈鼓应

《道教义枢》研究

王宗昱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道教义枢》研究/王宗昱著. -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1

(道家文化研究丛书)

ISBN 7-80646-231-7

I.道… II.王… III.道教-宗教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I207.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3869 号

责任编辑:李国强

封面设计:官超

《道教义枢》研究

王宗昱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邮件: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港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625 插页 3 字数 247,000

2001年1月第1版 200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100册

ISBN 7-80646-231-7/B·47

定价:22.00元



作者王宗昱 ▶

研究道教使我认识到我们两千年来官方学术对道教文化是隔膜的。无论是历史上的儒生还是“五四”以来的文化精英都对道教持敌视的态度，而实际上这态度或是出于儒教的立场，或是出于基督教的立场。道教的研究只有很短的历史。反省这段历史，我们会意识到我们只是说了许多我们自己喜欢的东西。我们离道教还很远。随着社会的进步，知识分子不应该再做自家宗教的祭司。我们的工作只是社会分工的需要，并不比别的工作更神圣。道教的学术研究要成为公民可以享用的资源，它必须是摆脱了研究者的宗教立场的。它不是为研究者自己享用的，也不是强迫别人享用的。我要做的不是提供绝对真理，而是帮助公民去了解宗教。我的作品也是商品，供公民自由选取。

▲ 作者王宗昱手迹

道

家文研究

化

研

究

丛

书

《道教文化研究》

道家文化研究丛书

总序

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一样对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有巨大影响,并且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德国哲学家雅斯伯思(Karl Jaspers, 1883—1969)曾提出“轴心时代”的观念,他认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在古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几乎同时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都对人类关切的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中国有老子、孔子,印度有释迦牟尼,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这些文化经过两三千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人类文化的主要精神传统,而且这些不同地域的不同文化,原来都是独立发展出来的,并没有互相影响,只是在后来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才产生了相互之间的影响。这说明老子开创的道家不仅是中国人的精神财富,而且也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

本世纪八十年代,在国内外对儒家学说的研究比较兴盛,相比之下道家思想的研究不像儒家思想的研究那么红火。但进入九十年代,国内外学术界对道家思想的研究开始重视起来。在国内不仅出版了不定期的丛刊《道家文化研究》,而且召开过多次国际性的“道家文化”的学术讨论会,还出版了一些颇有学术价值的专著,推动了道家文化的研究向纵深发展。

总观历史,我们可以说,儒道两家在思想上形成的某种互补格局(当然后来又有佛教的加入,形成了儒、道、释三家在中国历史上合流互动的局面),一直影响着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果说儒家思想的特点表现为一种人文主义精神,那么道家思想的特点则表现为一种自然主义的倾向。儒家大体上是从追求个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而发展为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即人类社会的和谐),例如儒家所提倡的“和为贵”、“致中和”等思想就表现了对人与人之间和谐的追求。道家则是从体认自然的和谐引申出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例如老子所说的“道法自然”和庄子所说的“太和万物”的思想,都表现了道家“崇尚自然”的特质。因此,对道家思想和对儒家思想的深入研究都是我们应特别重视的。从目前人类社会所面临的最重大课题看,大家都承认是“和平与发展”问题。人类社会要合理健康地发展就必须“和平共处”,因此就要调整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体地说就是要调整好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儒家思想可以为当今人类社会提供有意义的资源。但今日之世界不仅需要较好的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要考虑较好地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环境的保护问题),人类社会才可以“共同发展”,在这方面道家“崇尚自然”的思想无疑可以提供有积极意义的资源。因此,推动道家思想的研究是很有现实的和理论的意义。至于道家思想在哲学形而上理论层面的贡献,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宝库,而且也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精神财富。今天我们研究道家哲学理论需要以现代眼光给以新的诠释,使之日日新,贡献于世界。

道教是中国本民族的宗教，它和道家（老庄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可以说道教在思想文化上是道家思想宗教化的继承和发挥。道教作为一种宗教不仅对民间有着巨大影响，而且它对中国哲学以及文化的各个方面（例如文学、艺术、医药卫生等等）都有重要影响。查《道藏》中收入了对《道德真经》（《老子》）的注释五十余种，对《南华真经》（《庄子》）的注释十余种，这些注释都是在不同时期、不同历史条件下对老庄思想的发挥。如果我们说，先秦老庄是道家思想的第一期，即创始期；那么魏晋时期的“玄学”则可以被视为道家思想的第二期发展，例如王弼的《老子注》、郭象的《庄子注》都是对老庄思想的新的解释，并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到唐初兴起的“重玄学”，我们可以把它视为道家思想的第三期发展。道家思想的第三期重玄学是继承了魏晋玄学的思想、并吸取了印度佛教发展起来的，而它的建立则是通过对《老子》、《庄子》的注释实现的。唐初重玄学与魏晋玄学相比，它把道家本体论发展为道家心性论，而重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成玄英和李荣都是道教徒，而且以后大多数通过注释《老子》、《庄子》来发挥其思想的大都也是道教徒。这就是说，到隋唐以后，从哲学理论上，前此的道家思想是由其后的道教接着向前推进的。但道教作为一种宗教，它必有一超越的终极目标以及如何通过修持达到这一解脱生死目标的方法。重玄学虽然为此目标建立了以“理”、“性”、“心”、“气”的心性学架构，但它还没有提出一套为实现此目标的修持方法，其后有“内丹心性学”的出现。“内丹心性学”虽是唐末以后一直到宋明道教思想发展的特有形式，但从理论上，它仍然是道家思想宗教化的发展。就这个意义上说，道教的思想

理论是和道家的思想理论分不开的。我们编辑这套“道家文化研究丛书”就是基于这种考虑,把道家 and 道教联系在一起,都作为我们研究的对象。

这套“道家文化研究丛书”要求以专著的形式撰写,希望通过这套丛书的撰写和出版能提高道家 and 道教的研究水平。为此,我们组织了全国各地对道家 and 道教有较高研究水平的四十余位专家学者作为这套书的作者,计划在三至五年内出版四十本有关道家 and 道教的专著,每年出版若干本。这四十本书大体分为四组:道家发展史专题研究,是按照历史时期对道家作思想史的研究;道家思想专题研究,是对道家思想所涉及的问题进行的研究;道教思想专题研究,是对道教所涉及的问题进行的研究;道家、道教著作专题研究,选择对道家 and 道教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典籍进行研究。虽然这四十本书每本都是单独的专著,但是把这四十本书作为一个整体看,则又可以看到道家 and 道教的方方面面。

这套“道家文化研究丛书”是由北京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和中国文化书院主持编写的,它能够出版,是得到了台湾凯胜集团董事长黄胜得先生的资助,又得到了上海文化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对此我们表示感谢。

汤一介

1999年7月8日

序

研究道教的经典至少有四难：第一难是道教经典大都没有经过整理，研究它先得作大量的校点工作，然而可供校勘的参考材料不仅少，而且杂乱；第二难是道教经典往往很难确定是什么时代由谁编撰的作品，而且一部作品又常被后人增删，妄加篡改，致使很难复其原貌；第三难，在中国的著作中各种名物、概念、命题常有多种含义，且模糊不清，道教尤其，因此要作大量厘正的工作，才有可能知其意；第四难是道教作为一种宗教，它是一种信仰，宗教信仰免不了有其神秘性，而对研究者说如何透过其神秘性来把握其理论（或实践）的意义，是相当困难的。研究《道教义枢》上述种种困难大体上都会遇到。现在王宗昱同志克服了种种困难，对《道教义枢》作了一较为系统的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首先，王宗昱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道教义枢》作了校点，使我们有一种可以依据的文本；其次，他从“道体论”、“道典论”、“修道论”等三个方面对这部书作了剖析，为我们提供了可以把握《道教义枢》基本内容的基础；第三，王宗昱同志把《道教义枢》这部书放在唐初加以考查，从而使我们大体上了解道教从南

北朝到唐初发展的轨迹。对一部书作认真分析应是我们提倡的，这样才可以把研究工作推向深入，为此我向读者推荐本书。

我之所以对《道教义枢》这部书有兴趣，原因有二：一是，在我研究《太平经》时，见到《道教义枢》中著录有一百四十四卷的《太平经》，于是我对一百七十卷的《太平经》与一百四十四卷《太平经》的关系作了一点考证。又见记有“《太平经》以三一为宗”之语，故而据《太平经》之内容提出其所说“三一为宗”是指“天、地、人三者合一以致太平，精、气、神三者合一而长生”。现王宗昱同志根据六朝以来的道教史料提出“三一为宗”有诸说，特别指出有“原始说”、“旧说”、“新说”之不同，这非常有意义，从而把研究向纵深发展了。不过我认为《太平经》的“精、气、神三者合一”说在道教中仍然是很重要的一说，除我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第40页注所引《洞玄灵宝太上六斋十直圣纪经》外，还有许多地方都说到“精、气、神三者合一”问题的，如《云笈七籤》卷十引《太上老君虚无自然本起经》中有谓：“夫人形体之一，神为二，气为三，三一乃成人；又神为一，气为二，精为三，此三，三乃复成神”云云。我觉得特别应注意的是成玄英《道德经义疏》的“视之章”中云：“臧公三一解曰：夫言希、夷、微者，谓精、神、气也。精者，灵智之名；神者，不测之用；气者，形相之目，总比三法为一”云云。那么为什么《老子中经》、《玄门大义》（如《大义》列出九种“三一”说）又多有不同呢？我认为，很可能在道教中讲“精、气、神三者合一”是讲“道体”的问题，而《玄门大义》所列九种修持方法是讲的“道术”问题。“精、气、神三者

合一”基本上是个哲学问题,^①而如“三丹田说”、“三元君说”等等大体都是道教的修持问题。道教作为一种宗教自然讨论修持问题(“道术”)较多,而如成玄英等讨论哲学问题(“道体”)总是较少。这是我看了王宗昱同志的“三一义”后想到的一个问题,是否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还应作进一步研究。

我注意《道教义枢》还有另一个原因,希望通过这部书的研究对唐初道教所受佛教影响作一梳理,以便了解当时学术思想文化之走向。我们不难看出《道教义枢》无论在理论上还是修持方法上都大量吸收了佛教思想,而且此后的许多道书都有这样的问题。如果把《道教义枢》作为一典型分析,我想会对推动佛道关系的研究有一定意义。王宗昱同志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在《后记》中谈到,希望他有机会对这方面再作一点研究,这会对读者有更多的帮助。

汤一介

2000年8月28日

① 关于“精、气、神”问题对儒家思想也有影响,例如王阳明说:“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言谓之神。以其流行言谓之气,以其凝聚言谓之精,安可以形象、方所求哉?”(《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第62页)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道教义枢》的成书 [1]

第一节 学界诸说 [1]

第二节 《道教义枢》的时代背景 [4]

第三节 《道教义枢》与《玄门大义》 之关系 [21]

第二章 道体论 [33]

第一节 道教教义体系的结构 [33]

第二节 道德义 [50]

第三节 法身义 [65]

第四节 三宝义 [78]

第五节 混元义 [96]

第三章 道典论 [127]

第一节 三洞缘起 [127]

第二节 道教经典体系的神学基础 [135]

第三节 三皇文之论 [151]

第四节 关于《升玄内教经》 [160]

第五节 说十二部事 [169]

第四章 修道论 [197]

第一节 三一义 [197]

第二节 两半义 [224]

第四节 位业义 [259]

附录 《道教义枢》校勘 [285]

作者后记 [356]

《道教义枢》 的成书

第一节 学界诸说

《道教义枢》现存于《正统道藏》太平部，原题“青溪道士孟安排集”。这部道书受到学术界的注意始于陈国符先生的《道藏源流考》一书。陈国符先生很看重《道教义枢》中关于经典的材料。受陈先生的影响，许多日本学者先后对此书作了研究，不但把它看成研究道教经典编纂史的重要材料，更把它看作道教教义发展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日本学者的讨论又影响到近年来中国学者的道教史研究。

陈国符先生并没有对《道教义枢》的内容作批评性的研究，只是援引了其中的许多论述。关于《道教义枢》的作者，他根据杜光庭的《道德真经广圣义》序言中的记载，推定孟安排为南朝道士孟景翼，并且明确指出武则天时代的青溪道士孟安排不是《道教义枢》的作者^①。现在，中外学者都已经不

① 见陈国符《道藏源流考》，第二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

再同意陈先生的说法,因为仅从《道教义枢》援引了隋唐道经《海空经》和《本际经》这一事实就可以排除《道教义枢》是梁代作品,从孟安排的序言援引了《隋书·经籍志》就可以排除孟安排是梁朝道士。

以吉冈义丰先生为代表的几位日本学者都对《道教义枢》的作者以及成书的年代作了推定。京都大学教授麦谷邦夫先生在他的长篇论文《南北朝隋唐初道教教义学管窥》^①当中对日本学者的看法作了介绍。他们分别把《道教义枢》的成书时间断定为七世纪中期(吉冈义丰、福永光司)、公元700年前后(大渊忍尔、麦谷邦夫)、八世纪前期(镰田茂雄)。其中,吉冈义丰确定的年代最早,为公元656至665年之间,作者便是生活在这个时期的孟安排^②。为了排除孟安排为梁代道士的可能,吉冈义丰作了详细的考证,比较了众多材料。笔者不谙日文,无法了解其细节。他把成书年代确定在656至665年之间是因为《道教义枢》的序言援引了《隋书·经籍志》的文字,而此书是公元656年由长孙无忌等人写成进献给皇帝的。

大渊忍尔在1969年发表于《东方学》杂志的《道藏之成立》^③一文中考察了有关武则天的一则碑记《荆州大崇福观记碑》。它记载孟安排奏请武则天下诏修葺崇福观。大渊忍尔考查了青溪的地理形势和当地道风。根据《水经注》,青溪为

① 中译本收入《日本学者论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麦谷邦夫的介绍见其注释。

② 见吉冈义丰的《唐初佛道争论的一个资料》。此文最初发表于1959年,收入《道教与佛教》第一集。本书所用的是转载于《道教研究》第二册的文本。该书为吉冈义丰编辑,日本昭森出版社出版。

③ Ninji ofuchi, *The Formation of the Taoist Canon, Facets of Taoism*, p. 255, n5,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水名，汇入沮水。以其出于“青山”，故名青溪水。《太平寰宇记》说，青溪出于青溪山，在远安县南六十五公里。是则青溪为山名，青溪水以山得名。盛弘之《荆州记》说，此地多有道士筑庐隐居。大渊忍尔根据这些材料推测《荆州大崇福观记碑》中提到的孟安排很可能就是《道教义枢》的作者，其时代在公元700年前后。

汤一介先生也认为《道教义枢》序言援引了《隋书·经籍志》，因而孟安排不是梁代人^①。卢国龙在《中国重玄学》一书中对青溪山地区自晋代至唐代的道教发展概况作了考察^②，也断定《大崇福观记碑》中提到的孟安排就是《道教义枢》的作者。虽然现在中日学者都不再同意陈国符先生的结论，但是后人对孟安排的了解均有赖于陈先生发现的《大崇福观记碑》，大渊忍尔特别提到这一点。日本学者推翻陈国符先生的论断之后，关于孟安排事迹的考察一直没有进展。我现在也没有搜寻到有价值的史料。关于孟安排其人，除了《荆州大崇福观记碑》和杜光庭的《道德真经广圣义》以外，没有见到新的记载^③。至于《道教义枢》这部书，笔者目前仅在明人叶盛《菴竹堂书目》中见到有著录^④。关于这部书的问世以及编者孟安排的研究还有待发现新的材料。

① 见汤一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一书，第二八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② 《中国重玄学》第五章第三节。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

③ 元代《金莲正宗记仙源像传》序言中叙述梁代道士有“孟安期”，当是“孟安排”之误写。如此，则后世仍然受杜光庭的影响。

④ 丛书集成成本第三三册，第一三七页。

第二节 《道教义枢》的时代背景

《道教义枢》篇首附有编者孟安排的一则序言。它通常被用来探寻此书的成书背景及作者义趣。然而,从其行文看,其中多引述了流行的道经乃至《隋书·经籍志》中的概论性文字,而其余的文字则过于抽象。麦谷邦夫先生认为该序言意在弥补该书内容失于统绪的缺陷,而孟安排所以要引述这些经典敷论则是为了回应当时佛教方面对于道教的批评。日本学者看法很值得我们参考。这篇序言确实是此书的纲领,以开劫度人的教义为基础讲述了道教的由来。但是,它并不能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全书各章之间的关系。此外,它是否有意识地回应佛教方面的批评也尚无直接的证据,因为序言中讲述的义理自早期灵宝经以来即已流行,何必至此时方有功用。日本学者把道教的发展放在佛道关系的背景下考察确实使学术界的研究得到了很大的拓展,但是我们不应夸大《道教义枢》乃至《玄门大义》在这方面的意义;并且对于《道教义枢》的时代意义可以有不同角度的考察。笔者于此不甚注意《道教义枢》所处时代中佛道关系的情况。日本学者这方面的讨论还是有其价值的。

我认为《道教义枢》序言的重心不在前半部。作者援引经史无非要论证道教的真实性。这一宣教性文字也确实有其针对性,但不仅是针对佛家,也包括儒家,因为以元始天尊为虚诞的人不仅有佛教,更有儒教。麦谷邦夫先生指出序言表现了“三教一致论”。这更说明了《道教义枢》的作者并非仅仅是有感于佛道之争而发言立论。然而,笔者并不认为这是